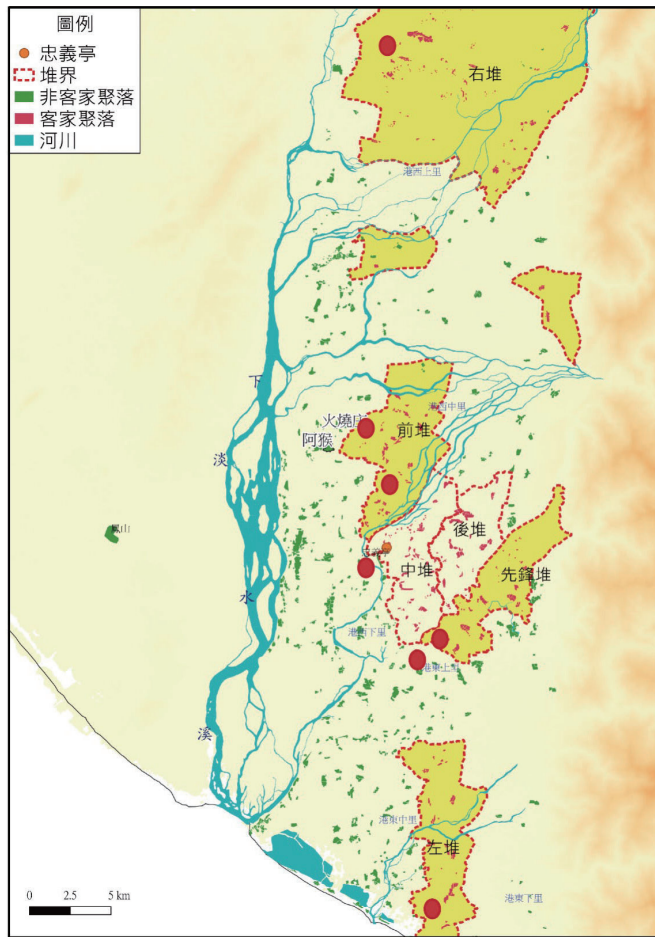


清朝皇帝在六堆客家鄉村

時間：114年10月13日(一)15:30-17:30
地點：國立屏東大學民生校區圖書館七樓學無已視聽教室
主講人：李文良(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)
主持人：黃文車(國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特聘教授)
與談人：李錦旭(國立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兼任副教授)
記錄：國立中正大學人文沙龍團隊

康熙六十年(1721)三月時，潮州籍農民杜君英(1667-1721)與漳州籍朱一貴(1690-1722)等人以「反清復明」為號召發動民變，先後攻克鳳山縣縣城(今高雄市左營區)及臺灣府城(今臺南市中西區)，朱一貴隨後於府城內尊奉明朝正朔，建年號「永和」。同年五月，諸羅縣人賴池等人亦響應起事，攻占諸羅縣縣治(今嘉義市)。至此，北起諸羅、南至下淡水溪(今高屏溪)的區域，皆為杜、朱集團所掌控。然而，杜、朱兩人隨後因權力爭鬥而導致集團內部分裂，形成閩、粵對立之勢。此內鬩使得位於下淡水溪地區、同屬潮州或惠州籍的客家墾民不願附隨。為了保衛鄉土，他們聯合下淡水溪以東的各大小聚落一萬餘人，於萬丹社上帝廟(今萬丹萬泉寺處)舉行「拜叩天地豎旗，立大清旗號，供奉皇上萬歲聖旨牌」等儀式。隨後，分設前、後、左、右、中、巡查及先鋒等七營，衛鄉自保，嚴防朱一貴勢力的侵擾。六月，朱氏部隊在客庄七營的夾擊下潰敗。與此前後，清軍自鹿耳門登陸，並於六月底攻克府城。朱一貴亦往北退走，最終被捕；杜君英則於九月投降清軍。兩人於十月一同被押解至北京。

事件結束後，客家族群撤銷巡查營，並將「營」改稱「堆」(意同「隊」字，以示與官軍有別)，形成常態性的團練組織以維持地方治安，是為「六堆」的濫觴。翌年，六堆群眾獲得官府頒賜義民封號、軍銜、賞銀賜米及免除差役等恩典。閩浙總督覺羅滿保(1673-1725)更在中堆之西勢建立忠義亭(今屏東縣竹田鄉忠義祠)，以祭祀朱一貴事件中戰死的客家人。此後，無論是雍正年間吳福生(?-1732)或乾隆年間林爽文(1756-1788)等人領導的民變發生時，六堆民團皆會在此亭聚眾誓師，協助清廷平定動亂。故此亭不僅是跨村落族群聯盟的重要象徵，也是凝聚粵籍移民認同的重要場域。



主講人李文良教授指出，「義民」作為粵籍移民的「自我宣稱」，除了源自官府的各项旌獎外，他們最初發起軍事對抗時所供奉的「皇上萬歲聖旨牌」（以下簡稱「萬歲牌」）也具有重要意涵。朱一貴率眾起事時，曾隨支援部隊來臺擔任幕僚的藍鼎元（1680-1733），在事後為治理臺灣提供擘劃時，撰寫了《平臺紀略》一卷。該書兩度提及六堆群眾「建大清義民旗，奉皇帝萬歲牌」、「南路客子團結鄉社，奉大清皇帝萬歲牌，與賊拒戰」，由此可見「萬歲牌」在起事儀式中具有特殊地位。

亂動平定後，義民領袖進呈給地方官員的稟文也聲稱，他們起事之際供奉萬歲牌的地點是萬丹社上帝廟，並將官方賞賜的稻穀作為該廟整修經費。這意味著義民所供奉的萬歲牌，很可能源自閩籍住民的核心地帶萬丹，而非今日粵籍集中的六堆區域。李教授進一步指出，萬丹是下淡水以南最早開發的地點之

一，早在十八世紀初已是下淡水平原重要的交通及商貿節點。粵籍移民在朱一貴事件中，捨棄所居的近山地區，來到閩籍移民大本營萬丹發起戰爭，應該是基於戰略等因素考量。然而，起事儀式中所供奉的萬歲牌，具體是怎麼樣的一種牌位？為何選擇供奉此物而非其他物件？在需要時如何能隨即取得？以及供奉萬歲牌的習俗究竟從何時開始、透過何種途徑在民間社會普及流行？這些都是本次講座要深入梳理與探討的問題。

1895年，臺灣因馬關條約被清政府割讓予日本，各地人民為反抗日本接收統治，發起武裝抗日行動，史稱「乙未戰爭」。當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宣布已平定臺灣之際，各地仍持續有小規模的武裝衝突。其中，六堆客家軍因襲擊日軍偵察隊，促使日方第二師團長下令編成約三千人的征討支隊，由山口素臣少將擔任隊長，前往征伐六堆地區。最終，日軍憑藉其優勢火力，擊潰了位於火燒莊（今屏東縣長治鄉長興村）的六堆客家軍本營，並縱火焚燬鄰近聚落，至此標誌著乙未戰爭最後一場戰役的結束。

根據隨山口素臣征討六堆的鳳山出張所雇員上野左京的日記紀錄，當時山口氏以忠義亭作為休憩地點。此亭即前述清代為祭祀朱一貴事件陣亡者所建。上野的紀錄顯示，廟內懸掛有清帝敕封的「精忠」、「懷忠」、「褒忠」三方匾額，正堂供有亡於朱一貴事件的義民眾牌位，而在中央處另供有「大清皇帝萬萬歲」



圖二：(左)鳳山出張所雇員上野左京之日記紀錄；

(右)臺南市善化區慶安宮側殿供奉之聖旨牌

(圖源：講者簡報)

牌位。由此可知，在清領末期，忠義亭中仍供有此牌位。然而，忠義亭戰後改稱忠義祠，現今已無此牌位，一般認為是日本統治時期因官方的禁制政策而遭毀棄佚失。

李教授透過長年田野調查發現，臺南市善化區慶安宮的側殿保存有一座萬歲牌，上刻「皇帝萬歲萬萬歲」七字。廟方表示此牌為康熙年間的遺物，原供奉於鄰近的關帝廟內，後因關廟毀壞而遷至現址。臺灣目前應另有三座型制相近的文物，分別位於新北市淡水區福祐宮、嘉義縣新港鄉水仙宮以及高雄市大社區觀音山大覺寺內。這四座萬歲牌型制相仿，皆仍供奉於各自的廟宇中。然而，官方發行的宣傳手冊或地方傳說，普遍將其宣揚為大清皇帝御賜之物，甚至可追溯至康熙皇帝親自頒賜。例如，新港水仙宮的萬歲牌雖據傳是康熙年間遺物，但該廟實際可追溯的歷史僅至雍正年間。又如，觀音山大覺寺的萬歲牌，地方傳說該寺係清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）由鳳山知縣楊芳聲興建，並獲康熙敕旨賜名「翠屏巖」，並獲頒萬歲牌；此牌現今供於後殿。但若實際考究，此牌背後刻有「廩生錢元揚率領士紳拜賀」等字。錢元揚之名也可見於清代臺灣方志，指其為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的府學歲貢生，並有《觀音山寺》等數首詩作留存至今。故可知大覺寺的萬歲牌應是地方仕紳自行供奉，而非朝廷頒賜之物。

清代臺灣尚有另一種寫著「聖旨」二字的萬歲牌。例如，新竹義民廟正殿神龕上方的楣梁安放有刻著「聖旨」二字的牌位。此牌普遍被認為是十八世紀末林爽文事件後，皇帝為表彰義民協助平亂所賜；但官方文獻僅記錄皇帝賜匾予村莊，並未提及為陣亡義民設廟及頒賜「褒忠」或「聖旨」匾額。此外，今屏東縣萬巒鄉萬金村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所建的天主教堂（聖母堂），在建物正中央也安置了刻有「聖旨」二字的石碑，儘管教堂文獻宣稱其為清朝皇帝賞賜，但也找不到官方文獻足以證明此事。

李教授指出，這些萬歲牌普遍與清代的宗教設施有關。宗教地點供奉萬歲牌並非清代臺灣的特例，而是普遍存在明清中國各地的現象。例如，位於西藏布達拉宮的殊勝三界殿（薩松朗杰）是七世達賴喇嘛的寢殿，殿內供有一座以藏、漢、滿、蒙四種文字書寫的「當今皇帝萬歲萬萬歲」牌位。牌位上方供奉清乾隆皇帝的肖像唐卡，周圍則陳列著金剛持、宗喀巴等塑像。此殿內尚有十三世達賴喇嘛以萬兩白銀鑄造的十一面觀世音像，是宮內頗為重要的佛殿之一，許多重大活動皆在此殿舉行。清代時，每逢藏曆年初一和皇帝誕辰，達賴喇嘛都要率領西藏百官前來此處向中央政府朝拜。

魯迅小說《阿Q正傳》中，趙秀才在聽聞革命黨人進城後，連忙把辮子盤在頭上，去尋訪革命伙伴。為了展現其革命進步的態度，他們搗毀了鄰近廟宇內，象徵帝制傳統的「皇帝萬歲萬萬歲」龍牌。魯迅本人在回覆日本友人山上正義的信件中，曾談及這座龍牌的型制：「以木板製成，四邊刻有龍的飾紋，供於佛前，高一尺五寸」，顯示廟中供奉的萬歲牌並非魯迅憑空想像，而是他在日常生活中親眼所見的實物。李教授認為，宗教場所中供奉的萬歲牌，雖然有些確實來自朝廷賞賜或官方刻置，但更多的應是源於廟方或地方仕紳的自行供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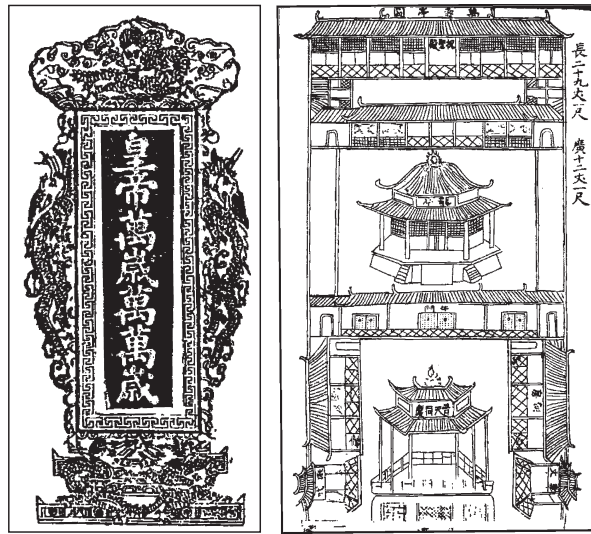
除了宗教機構，在鄉村的日常性宗教活動中，亦可見萬歲牌的身影。李教授指出，流傳於明清民間社會的宗教經卷「寶卷」，其卷首也經常印有萬歲牌位。一般認為，寶卷是受佛教講經文、變文影響所產生的講唱文類，內容涵蓋了宣說講唱佛教經典，以及講述民間通俗故事的作品，屬於佛教世俗化的現象之一。由現存的明清寶卷資料來看，在正文開展前，通常會有佛陀說法像以及三種龍牌形式，其文字或排列順序或有差異，但大致內容為：

第一塊龍牌：上書「皇圖永固、帝道遐昌、佛日增輝、法輪常轉」。

第二塊龍牌：上書「皇帝萬歲萬萬歲」、「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」或「當今皇上萬歲」。

第三塊為寫有「六合清寧、七政順序、兩陽時若、萬物阜封、億兆康和、九幽融朗、均躋壽域、傳種福田、上善攸臻、障礙消釋、家崇忠孝、人樂慈良、官清政平、訟簡刑措、化行俗美、泰道咸亨、凡厥有生，俱成佛果」字句，據稱係明永樂皇帝為《北藏》的題詞，故一般會寫有「御製」兩字，亦稱「御制經贊」。

對於一般民眾而言，建寺印經耗費不貲，恐非其財力所能承擔，因此參與講經等宗教活動便成為滿足宗教需求的主要途徑。自宋元以來發展的民間宣卷活動，即是滿足此類宗教需求。明代寶卷進一步擴展到民間各種宗教，發展蓬勃；至清代，宣卷作會已深入各地民間社會，成為百姓信仰、教化與娛樂的重要活動。民間宣講寶卷時，多由職業的宣講藝人或僧尼主持。不論是經桌上供奉的龍牌，或寶卷中印製的各式龍牌，應是模仿一般佛寺的講經儀式而來，屬於一種宗教性的活動。在政府高壓取締民間宗教結社活動的時代背景下，這種作法是為了宣示其儀式的合法性或正統性，藉此回應國家對於社會組成群體、結盟儀式的猜忌。



圖三：(左)民間寶卷刻印之萬歲聖旨牌；(右)萬壽亭平面圖(圖源：講者簡報)

李教授實際比對了大覺寺與慶安宮萬歲牌的型制，認為兩者差異頗大。然而，慶安宮現存的萬歲牌可能是脫落了基座與周邊的龍紋飾版，僅殘存書寫文字的主體部分，因此推斷兩者原本的外型應是一致的。現存較為完整的萬歲牌，也更接近魯迅致信友人時所述，以及民間寶卷卷首所印製的型制。

關於朱一貴事件中六堆義民起事之際所供奉的萬歲牌，據閩浙總督覺羅滿保上呈皇帝的報告指出，該牌位由兩位義民領袖率領三千部眾，護送至臺灣府城的「萬壽亭」供奉。李教授認為，供奉萬歲牌此舉，是為了宣示其團體的正當性。這些不屬於政府正規軍編制的義民團體，跨越所處地區，手持槍械並以類似軍隊的方式協助官兵掃蕩叛亂，必須透過反映皇帝身分的萬歲牌為前導，藉以區隔自身並非叛軍匪徒。

至於事後護送萬歲牌前往的府城「萬壽亭」，此處係康熙五十年(1711)時，由臺廈道官員為慶賀兩年後康熙六十大壽所籌建，六年後地方又共同捐資擴建，成為十八世紀上半葉臺灣地方文武官員舉行朝賀儀式的場所。事實上，地方文武官員在任所集會祝賀皇帝誕辰，是來自朝廷規範的禮儀。據相關文獻所載，各省地方官每逢元旦、皇帝生日、冬日三大節慶，必須行拜「龍牌」之禮以示慶賀。龍牌所擺置的位置，實為地方官員與皇帝權力接觸的場合。在《臺灣府志》中也記載了所謂「接詔儀」：皇帝詔書送抵前，各文武官員需準備「龍亭」、儀仗、鼓樂等進行接應。宣讀詔書者，亦須行三跪九叩禮後，方從龍亭請出詔書跪讀，再將詔書捧置龍亭之內。李教授推論，所謂的「龍亭」並非像萬壽亭一



圖四：(上圖)黃文車教授(左)主持本場講座，李文良教授(中)精彩演講以及與李錦旭教授(右)對談；(下圖)講座合影(圖源：人文沙龍團隊)

類的固定建物，而是一種木製可移動的器具，類似神龕或轎子，其內供奉皇上萬歲牌位，象徵著皇權所在。從上述跡象來看，為祝賀皇帝萬壽而興建的萬壽亭，在其內部理應也有於龍亭內擺置萬歲牌的儀式。

李教授總結，六堆義民所供奉的萬歲牌，應是指為祈求皇帝長生的木製牌位。此牌位平時安置於寺廟內受人膜拜，鄉村社會常將其宣稱為皇帝所賜，而實際上，往往是地方仕紳或廟方自行仿製供奉，其核心目的在於表達宗教機構、信眾(鄉村社會)和王朝(皇帝)三者之間的關係。

萬歲牌並非純然是民間社會與宗教的產物。萬壽亭內擺置萬歲牌，是因為空間距離與身分皆不足以覲見皇帝的地方官員，為表達祝賀心意所設。對於位處海外邊陲的臺灣官民而言，萬歲牌無異就是皇帝的化身，同時也反映了王朝制度、禮儀（如接詔、祝壽）與地方社會的複雜關係。十八世紀末發生林爽文事件，乾隆皇帝派遣心腹大臣福康安抵臺鎮壓。福康安在結束了南下恆春掃蕩的任務，啟程北返的途中，亦曾親自來到六堆忠義亭拜謁萬歲牌。滿人出身又身居高位的福康安，或許對於漢人廟宇本身並無太大興趣，但從他親臨並拜謁萬歲牌的舉動，可想見此牌位為地域社會所帶來的強烈皇權象徵意義。